

论《管锥编·毛诗正义·君子于役》的方法论意义

王人恩

(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君子于役》是一首在家的妻子思念久役在外而不得回家的丈夫的诗。顾炎武却认为其主旨是“讥钟鸣漏尽而不知止之人”,钱先生敏锐地发现了顾氏说《诗》乃是“意有所讽,借题发策”,是有感于明末清初混乱的社会现实而指桑骂槐。《君子于役》开启了古代诗文“暝色起愁”意象的先河,王安石不清楚《君子于役》所确立的黄昏意象,不了解皇甫冉“暝色起春愁”渊源有自,因而擅改皇甫冉诗句;王士禛也不知道皇甫冉“暝色起春愁”的渊源,所以附和王安石,谓肿为肥,且把它写进了论诗绝句。《管锥编》将金针度人,做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批评,给后人昭示了不少至为精彩的读书、研究方法。

关键词:君子于役;学术陈案;批驳;《管锥编》;钱钟书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3-0159-05

前人赞美注《文选》的李善“淹贯古今”,窃以为钱钟书“淹贯古今中外”。《管锥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读书、研究方法既多且精,超迈前人和今人。兹就《管锥编》论《毛诗正义·君子于役》作些初步探究,以尝一脔。

一、顾炎武的有意误读与钱钟书的善意批驳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鸡栖于桀,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①

与《管锥编》的基本体例相一致,钱先生先节引《君子于役》原诗,然后加按语:“按《日知录》卷三论此诗”,而未引顾炎武论诗原文,只隐括其义以做介绍。今按《日知录》卷三《日之夕矣》条载: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当归之时也。至是而不归,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原注《烈女传》)“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原注《檀弓》)于文“日夕为退”。(原注《说文系传》)是以樽罍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原注《曾子问》)至于酒德

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1](90)}

满腹经纶的顾炎武引经据典,旨在阐明古时人们的生活规律,社会安定,彼时“樽罍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卜夜”即“卜昼卜夜”之缩语,典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指聚饮无度、昼夜不休为“卜昼卜夜”。“衢路有宵行之禁”,典出《周礼·秋官·司寤氏》:“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是知周代有专门在夜晚管理城市秩序者(略等于现代城市里的夜间巡查员),夜深了就不让人们随意行走,而深夜奔走者只有两种人:“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顾氏所描述的正是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时代。在顾氏看来,到《君子于役》问世的时代,社会混乱,人心不古,民风大变,人们的酒德衰败而作长夜之饮,官吏邪心作起而“昏夜乞哀”——哀者,爱也,即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分昼夜地追欢买笑。邪恶并作的恶果之一就是无人为“宵行之禁”,官员失职,民风不正,社会上下“卜昼卜夜”地酗酒,官吏深夜东奔西跑地买笑追欢,才导致“君子”当归之时而不归。所谓“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盖指昼夜颠倒,官场腐败,风俗大坏。据此,顾炎武认为诗中的“君子”是指一个“日暮不归,晦明乱节”的人。从其论述看,顾氏是把《君子于役》作为讽刺诗看待的,诗的主旨是“讥钟鸣漏尽而不知止之人”。他贵古贱今之意很明显。

收稿日期:2015-10-05;修回日期:2015-12-10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管锥编》破解古代文学学术陈案研究”(14YJA751023)

作者简介:王人恩(1958-),男,甘肃兰州人,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红学,钱学

关于《君子于役》的主旨,《毛诗序》云:“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而顾炎武别出心裁,却认为主旨是“讥钟鸣漏尽而不知止之人”。十分了解顾炎武的人品、文品的钱钟书深悉顾炎武的用意,他研究透了顾氏如此解说此诗的用意和目的,于是在驳论之前先用宕开一笔的手法揭明顾氏如此解说乃是“意有所讽,借题发策,不自恤其言之腐阔也”。换言之,学富五车的顾炎武不可能连《君子于役》都读不懂,读者万万不可被顾氏的“狡狴笔法瞒弊了去”(借《红楼梦》脂批语)!钱先生敏锐地发现了顾氏说《诗》乃是“借题发策”,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他首先从顾炎武的心理动机方面揭明说顾氏是“意有所讽”,亦即顾借解诗而另有讽刺寄托,故不怕别人说他迂腐疏阔。即此而论,钱钟书真是顾炎武的知音,顾氏为躲避文字狱而借题发挥的“狡狴笔法”为钱钟书一眼看出,顾氏所放的烟幕为钱钟书所廓清。

先找出前人错误观点的症结所在,再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和批驳,这是《管锥编》常用的手法;而要驳倒像顾炎武这样的大学问家,又谈何容易!请看钱先生的精彩驳论:

君子于役,初非一端。击鼓南行,零雨西悲;六轡驰驱,四牡骅骝;王事靡盬,仆夫况瘁。劳人草草,行道迟迟,岂皆能如泽耕耒耜之朝出暮返乎,而未始不昼动夜息也。顾氏欲讥钟鸣漏尽而不知止之人,遂将此诗专说成日暮不归,置远役未归于度外。“苟无饥渴”,即《采薇》之“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正不必为盼待君子“自公退食”也。《齐风·载驱》曰:“鲁道有荡,齐子发夕”,固刺“宵行”;而《小雅·頍弁》曰:“乐酒今夕,君子维宴”,《湛露》曰:“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又美“卜夕”。顾氏之言,诚为迂拘;谅其忧时愤世之志,毋以词害可矣。^①

这段文字言简意赅,须做一些疏解。

钱先生先用“君子于役,初非一端”两句宕开一笔,总说一句,那么究竟有几端呢?钱先生再引《诗》论《诗》,即以《诗经》语说《诗经》事,不劳远取:“击鼓南行,零雨西悲;六轡驰驱,四牡骅骝;王事靡盬,仆夫况瘁”这二十四字皆自《诗经》隐括而来,“击鼓南行”出自《邶风·击鼓》;“零雨西悲”出自《豳风·东山》;“六轡驰驱”出自《秦风·小戎》;“四牡骅骝”出自《小雅·四牡》;“王事靡盬”出自《小雅·采薇》(亦见于《小雅·杕杜》);“仆夫况瘁”出自《小雅·出车》。《击鼓》是写远征士卒长期不得归家的怨愤之情;《东山》是士卒出征三年后班师回乡而作的诗;《小戎》写秦君带兵出征而在家的妇人思念征人,《毛诗序》云:“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

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四牡》是写在外服役者辛苦和思家的情绪;《采薇》是戍边士卒唱出的怨歌;《出车》写周宣王派大將南仲领兵征伐玁狁,胜利回朝。总之,上述诸诗都是写将帅士卒“行役无期度”而长夜不归,但是他们的长夜不归是出于无奈,远离故乡亲人而无法朝出暮返;“君子于役,初非一端”者,盖言“君子”行役在外、不能朝出暮返于形式上相同,而原因各异,或“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诗),或“故园东望路漫漫”,或“万里还乡未到乡”(卢纶诗),或“却望并州是故乡”(刘皂诗),或“孤戍迢迢蜀路长”(薛逢诗),或“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罗邺诗)。这是《诗经》中“君子于役”之六端,这些“君子”的远役未归不是因为“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哀”,他们当归不归、向晦不息的社会原因比较复杂。

“劳人草草”出自《小雅·巷伯》,《巷伯》是西周王朝寺人孟子遭到谗毁而发泄内心愤懑的诗,《毛诗序》云:“寺人伤於谗,故作是诗也。”“行道迟迟”出自《邶风·谷风》,这是一首弃妇的怨歌。至此钱先生反问一句:“岂皆能如泽耕耒耜之朝出暮返乎?”“泽耕”出自《周颂·载芟》,《毛诗序》云:“《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这首诗是周王在秋收以后用新谷祭祀宗庙时所唱的乐歌,诗写到了开荒、耕种、收获、造酒、祭祖求福等事。耒耜,出自《周颂·良耜》,《毛诗序》云:“《良耜》,秋报社稷也。”这首诗是周王在秋收以后用新谷祭祀土神和谷神的乐歌,诗写了一年的农事,从耕地、播种、除草、丰收到祭祀祈福。未行役而在家的劳动者一般是朝出暮返,劳动者的朝出暮返岂能与寺人的不能回朝、弃妇的无家可归同日而语?钱先生又认为这些人“未始不昼动夜息也”。总而言之,“劳人草草”是一种因忧愁遭谗而晚归,“行道迟迟”是由于被男人抛弃而无家可归,“泽耕耒耜”是由于劳作耕田而朝出暮返,原因目的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点是“未始不昼动夜息”。

钱先生看出了顾氏的用心所在:讥钟鸣漏尽而不知止之人,即在位者不实行宵禁而失职了,也就是执政者因失职而导致风俗败坏。故钱钟书指出,“遂将此诗专说成日暮不归,置远役未归于度外。”钱先生的驳论可谓洞察秋毫。顾氏为清初大学者,博涉多通,气节很好。顾炎武原名顾绛,因慕文天祥门生王炎午之为而改名为炎武。顾炎武一生论学有两句名言“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日知录》初刻于康熙九年(1670),这一年他58岁,死于康熙二十一年(1628),享年70岁。也就是说《日知录》成书于他的晚年。顾由明入

清，清兵攻破南京，他志谋恢复而失败，然终不向清朝统治者投降，誓死不仕二君。像他这样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不可能读不懂《君子于役》，他为什么把《君子于役》专说成写的是日暮不归、官府失职、民风大乱呢？他是在泻私愤，这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这就是文人的狡佞笔法。所以说清代有严密的文网是正确的。《四库全书总目》评曰：“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2](1029)]可以玩味！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云：“亭林志在经世，于历代典章因革、政教利弊，了如指掌。凡所考证，皆引古以筹今，留意民瘼，不忘当代。”^3]清初有所谓的“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顾氏解《诗》的确是“留意民瘼，不忘当代”，意在追求“有用之学”，故“不自恤其言之腐阔也”，为了借古讽今，他全然无视《君子于役》之士卒远役未归、家人忧愁思念的主旨，而错误地将行役在外难以归家者等同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不惟如此，钱先生进一步以《诗》论《诗》，他认为《君子于役》中的“苟无饥渴”，意同《采薇》里的“行道迟迟，载饥载渴”，均言行役者的艰苦生活，而不同于家人盼望等待君子回家吃饭——“自公退食”。

“自公退食”出自《召南·羔羊》：“委蛇委蛇，自公退食。”朱熹《诗集传》：“退而食于家也。”从衙门下班归家吃饭的君子是何等的惬意，自然不同于饥渴缠身的行役士卒，同是饥渴，情景不同，地点各异！那么，《诗经》中有无刺宵行、美卜夜的诗呢？有，钱先生又引《齐风·载驱》“鲁道有荡，齐子发夕”，说明这的确是刺宵行之作。《载驱》是齐国人讽刺文姜肆无忌惮地与齐襄公通奸的诗（《齐风》中的《南山》《敝笱》，可以和《载驱》合观对读）。孔颖达《正义》云：“《载驱》诗者，齐人所作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无礼义之故，乃盛饰其所乘之车与所衣之服，疾行驱驰於通达之道，广大之都，与其妹文姜淫通，播扬其恶於万民焉，使万民尽知情，无惭耻，故刺之也。”据《左传》记载，齐襄公和同父异母之妹文姜通奸，后来鲁桓公娶文姜为妻。婚后十五年，鲁桓公带着文姜到齐国去，桓公发现文姜与襄公仍有奸情，于是斥责文姜，文姜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恼羞成怒，派公子带人杀死了鲁桓公，因此齐人就唱《南山》这首诗来讽刺齐襄公、文姜。后来文姜成了寡妇，但她还是经常到齐国去和齐襄公幽会，齐人就唱《敝笱》来讽刺她。“鲁道有荡，齐子发夕”，说文姜早上去幽会而晚上回来，《敝笱》的确是讽刺宵行的，讽刺得非常幽默，而又跌宕有致。《诗经》里确实有顾炎武所说的“刺宵行”的诗，《载驱》即是其例，这是退一步的写法。

《诗经》中美“卜夕”者，钱先生举出《小雅·頍弁》的“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和《小雅·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二例。“乐酒今夕，君子维宴”两句写贵族请宾客吃饭，宾客表示感谢，的确是写夜晚的开怀畅饮；《湛露》是周天子宴请诸侯的诗；也有人认为是贵族宗庙落成宴请宾客的诗；不管是哪一种讲法，总之，它是表示感激和祝贺的诗。“厌厌夜饮，不醉无归”的确是朝出暮返，诗是赞美“卜夜”的，但它的产生不是顾炎武所称道的天平时代，而恰恰是《君子于役》问世的同一时代，亦即顾炎武所抨击的“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的时代。质言之，顾炎武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诗经》中有讽刺“宵行”的，也有赞美“卜夕”的，钱先生一一举例说明，这些诗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他得出结论：“顾氏之言，诚为迂拘；谅其忧时愤世之志，毋以词害可矣。”这句话十分精彩，对于顾炎武的过分迂拘，钱先生体谅有加，并用了《孟子·万章》的典故“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也”，指出说解《诗经》的人不要“以辞害志”，而要“以意逆志”。说《诗》者可以揣测创作者的心志（即创作主旨），或许能找到诗的主旨。顾是“借题发策”，是有感于明末清初混乱的社会现实而指桑骂槐，钱先生认为，不能因为顾氏对《君子于役》解说得不准确就全盘否定他的“志”。那么顾的“心志”是什么呢？就是“忧时愤世”。这几句话启发我们读书必须要知人论世，不能太迂拘；否则就会上当，就不是“解人”了；而钱先生对顾炎武善意批评可谓“大是解人”。“谅”一词表现出钱先生的宽厚，因为驳论是平和有据的，这亦可见出钱先生的大家器度和对《诗经》的熟稔。

二、《管锥编》对“暝色起愁”意象的阐释和钱钟书对王安石改诗、王士禛附和的批评

暝色起愁，这是《管锥编》对《君子于役》主旨的精辟概括，从《诗经》研究史来看，这是《管锥编》第一次揭示出《君子于役》的黄昏意象，值得表出。钱先生采用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方法，打通古今，打通中外，全方位地论证了“暝色起愁”这一诗歌意象或曰诗学母题。他金睛识玉，先引了人们很少提及的许瑶光《雪门诗钞》卷一《再读<诗经>四十二首》第十四首：“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前两句隐括《君子于役》的内容，第三句下断语，认为《君子于役》已开启了唐人闺怨诗之先河。钱先生很欣赏许瑶光的诗作，给

予很高评价“大是解人”。以下引了赞、赋、诗及西人丁尼生的诗句展开进一步论证。如白居易的《闺妇》诗：“斜凭绣床愁不动，红销带缓绿鬟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这首诗很有名，胡应麟将之推为“中唐后第一篇”。“夜合花前日又西”，言夜合花是昼开夜合，比喻男女白天分开，夜间要相会；现在夜合花开了，太阳偏西了，可夫君还未回来，这正是说“日夕足添闺思”。钱先生又引了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并认为“又可释日暮增愁之故”。吕温是中唐山西永济人，其《药师如来绣像赞》文字不长，钱先生节引了几句，这几句是借赞语设想别后思念之情，作于吕温出使吐蕃之前，写他不忍离别妻子的复杂心情，孰料一去即遭扣留，这些话不幸被他言中。

问题在于，什么人到黄昏时才起愁？钱先生用一个“盖”字领起以下几句：“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昏黄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文心雕龙·物色》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人的感情可由眼前外物的变化引起变化，牛羊之下山，鸡鸭之回窝，鸟雀之归巢，均可引起倚门望归者的极度感伤，牛羊、鸡鸭、鸟雀尚有团聚之时，繁我独无！钱先生的目光还投向域外，指出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写懊悵怀想欢子，不舍昼夜，而最憎薄暮日落之际”，之后总结道：“诗人体会，同心一理。”潘岳的《寡妇赋》、韩偓的《夕阳》诗、赵德麟的《清平乐》词也是写“暝色起愁”，它们的“取景造境，亦《君子于役》之遗意”。换言之，由《君子于役》最早开启的“暝色起愁”的黄昏意象强烈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后来诗文曲赋中描写黄昏增愁的诗文俯拾皆是，它们的源头就是《君子于役》；更可注意者，不仅女的在黄昏时增愁，男子也不例外，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之“愁因薄暮起”、皇甫冉《归渡洛水》之“暝色起春愁”，即为佳例。经过钱先生的严密论证，《君子于役》的黄昏意象确立了起来，后世凡写黄昏者，大都有“愁情”寄托其中。

不惟如此，心细至极的钱先生还发现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时把皇甫冉的诗“暝色起春愁”改成了“暝色赴春愁”。这不单单是一字之改，因为这既说明王安石未能准确理解《君子于役》的黄昏意象，又由于王士禛的附和、赞赏王安石之改而形成了一桩学术公案。钱先生指出：

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云：“愁因薄暮起”，皇甫冉《归渡洛水》云：“暝色起春愁”，有以也夫，正不必如王安石之改皇甫冉诗“起”字为“赴”（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六又后集卷九引《钟山语录》），更不须如王士禛《论诗绝句》之附和也。

于无疑处生疑！钱先生在这里只是金针度人，而未深加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做些爬梳勾稽，考《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六载：

《石林诗话》云：“王荆公从宋次道借本编《百家诗选》，中间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复定为‘赴’字，以语次道曰：‘若是起字，谁不能之。’次道以为然。”苕溪渔隐曰：“余观《钟山语录》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即小儿言语也。’所云止此，不知石林之说何从得之？”^{[4](242)}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九引《钟山语录》与此略同，不再征引。由此可知，宋次道看到《百家诗选》改“起”为“赴”，他大概是尊重皇甫冉原作或是欣赏“起”字起见，径改为“暝色起春愁”；而王安石又改为“暝色赴春愁”乃是出于臆改，也是他一己诗学观的体现，这表明王安石根本不懂皇甫冉是从《君子于役》“暝色起愁”这一意象学来的，他不知源因而不明流，所以私智立异，妄加改动。王安石好改他人之诗且喜化用前人诗句“以为己诗”，钱先生所举例证很多，《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载：

苕溪渔隐曰：“王驾《晴景》云：‘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兼无叶底花，蛱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此《唐百家诗选》中诗也。余因阅荆公《临川集》，亦有此诗，云：‘雨来未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百家诗选》是荆公所选，想爱此诗，因为改七字，使一篇语工而意足，了无鑿斧之迹，真削鑿手也。”^{[4](184)}

钱先生在深入研究王安石诗后指出：“每逢他人佳句，必巧夺豪取，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本为偶得拈来之浑成，遂著斧凿拆补之痕迹。”^{[5](245)}在《宋诗选注》中，钱先生还一语破的：“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也是他（王安石）培养了根芽。”^{[6](148)}要之，王安石未能认识清楚《君子于役》所确立的黄昏意象，因而不了解皇甫冉“暝色起春愁”渊源有自，因而擅改皇甫冉诗句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王安石改得好，如前引《苕溪渔隐丛话》的纂集者胡仔即赞美“因为改七字，使一篇语工而意足”。无独有偶，清代大诗人王士禛也随声附和，钱先生所言王士禛《论诗绝句》即《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十三：

诗人一字苦冥搜，论古应从罔象求。

不是临川王介甫，谁知暝色赴春愁。

与王安石不懂皇甫冉是从《君子于役》“暝色起愁”

这一意象学来的一样，王士禛也不知道皇甫冉“暝色起春愁”的渊源，所以不加分析地附和王安石，谓肿为肥，而且把它写进了绝句。若无钱先生的论析，后人则不容易看出王安石的错误和王士禛的可笑。王士禛是清代诗坛执牛耳者，但有时也会闹出笑话来。这可以说是一桩学术公案，不少人认为王安石、王士禛是正确的，而钱先生对此做了彻底的否定。钱钟书溯源明流地进行了破解，可以认为，“暝色起愁”是钱先生第一次从中国文学中总结出的一个可以成为定论的艺术表现手法，前无古人，又后启来者。《管锥编》的博大精深，于此可见一斑。

破解学术陈案，是钱钟书研究古代文学达到全新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他在运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以《诗》论《诗》、溯源明流、阐释循环诸方法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域外，既打通古今，又打通中外，达到了“拾穗靡遗，扫叶都尽，网罗理董，俾求全征鲜，名实相符”^{[7](854)}的境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因此，研究、总结《管锥编》等钱著对古代文学陈案之

梳理与破解，对于明白钱钟书的著作已经谈到了什么，总结出了什么，以避免学人的闭门造车、重复研究，从而养成一种新的、严肃的、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学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注释：

- ① 本文所引《管锥编》论《君子于役》文字除注明者外，均见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00-102页，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一册第100-102页。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 [1]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 [2]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 张舜徽. 清人笔记条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4] 胡仔. 茗溪渔隐丛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1962.
- [5] 钱钟书. 谈艺录(补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6] 钱钟书. 宋诗选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7] 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On significance of the methodology in *Guan Zhui Bian • Mao Shi Zheng Yi • Husband in Army*

WANG Rene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Husband in Army* is a poem about a wife at home who missed her husband while he had to take long service and could not come home. Gu Yan-wu believed that the poem aimed “to ridicule people who did not know that they should stop even when the bell rang and the water clock dripped off.” Mr. Qian Zhong-shu, however, was acute to find that Gu’s comment on the poem “meant to satirize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ubject to get policy”, and that Gu was actually affected by the chaotic social reality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hence pointing at one yet abusing another. *Husband in Army*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image of “dusk arousing sorrow” in the ancient poetry. Wang An-shi failed to recognize the dusk image established in *Husband in Army*, or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of Huang Fu-ran’s “dusk arousing spring sorrow,” changing Huang Fu-ran’s verse line at will. Wang Shi-zhen, who did not know the origin of Huang Fu-ran’s verse either, echoed Wang An-shi, viewed swelling as fat, and compiled it into seven-word poems on poetry review. *Guan Zhui Bian* made pertinent and convincing criticism, hence leaving splendid methodology on reading and research to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Husband in Army*; academic case; refute; *Guan Zhui Bian*; Qian Zhong-shu

[编辑：胡兴华]